

中国近代哲学史

(内部讨论稿)

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近代哲学史》编写组

1976年12月

目 录

第 一 章	鸦片战争期间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哲学思想.....	(1)
第一节	地主阶级改革派要求社会改革思想的产生及其与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	(1)
第二节	龚自珍对儒家传统思想的批判及其哲学思想.....	(5)
一	龚自珍对儒家传统思想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	(6)
二	龚自珍的更法改制思想.....	(9)
三	龚自珍对儒家天命论和先验论的批判.....	(15)
第三节	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及之而后知”的认识论.....	(21)
一	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爱国主义思想.....	(22)
二	魏源的“气化不息”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及其进步的历史观.....	(26)
三	魏源的“及之而后知”的认识论.....	(31)
第 二 章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领导者反封建传统的进步哲学思想.....	(40)
第一节	洪秀全反对封建传统思想的斗争及其《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	(43)

一	披着宗教外衣的革命组织——“拜上帝会”	(43)
二	洪秀全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反孔斗争	(50)
三	洪秀全反对封建传统思想的斗争	(57)
四	《天朝田亩制度》反映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64)
第二节	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及其哲学思想	(70)
第三章	戊戌变法运动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哲学思想	(80)
第一节	洋务运动的破产与初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兴起	(80)
第二节	中日甲午战争后以戊戌变法运动为标志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高涨	(97)
第三节	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领导者康有为的哲学思想	(106)
一	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思想和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运动	(106)
二	康有为的“以元为本”的自然观	(114)
三	康有为的历史进化论——“公羊三世”说	(121)
四	康有为的认识论和人性论	(130)
五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	(137)
第四节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激进派谭嗣同的哲学思想	(142)
一	谭嗣同的政治活动及其《仁学》著作	(142)
二	谭嗣同以“以太”“仁”为核心的宇宙观	(147)

三	谭嗣同的“日新变化”的发展观·····	(160)
四	谭嗣同对封建名教“冲决网罗”的批判精神·····	(167)
第五节	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的哲学思想·····	(174)
一	严复对封建“中学”、“旧学”的批判和对资产阶级“西学”、“新学”的传播·····	(174)
二	严复的机械唯物论·····	(180)
三	严复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	(184)
四	严复的社会历史观·····	(189)
第四章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哲学思想·····	(197)
第一节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大论战·····	(197)
第二节	革命民主派宣传家章太炎的哲学思想·····	(207)
一	章太炎的早期革命·····	(207)
二	章太炎的尊法反儒思想·····	(213)
三	章太炎的《馥书》和他早期的唯物主义思想义思想·····	(219)
四	章太炎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234)
五	章太炎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和历史进化观·····	(241)
第三节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的哲学思想·····	(249)
一	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249)
二	孙中山的自然观——宇宙进化论·····	(254)

(160)	三 孙中山的认识论——“知难行易”学说	
	(260)
(167)	四 孙中山的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	(266)
(174)	后记	
(177)	
(180)	
(184)	
(189)	
(197)	
(197)	
(205)	
(207)	
(213)	
(219)	
(234)	
(241)	
(249)	
(249)	
(254)	

第一章 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哲学思想

第一节 地主阶级改革派要求社会改革思想的产生及其与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

一八四〇年，英国资本主义为了要把中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以保护鸦片贸易为借口，对中国发动了可耻的侵略战争，用军舰和大炮极其野蛮地轰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从此，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武装入侵也就接踵而至，使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开始。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社会已是江河日下，穷途末路。由于清封建王朝的统治者贪婪无厌地掠夺农民土地，而使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官僚地主的手中。其中多则往往占有“膏腴万顷”。如乾隆时清贵族和珅霸占了土地八十余万亩；鸦片战争时的投降派大官僚琦善，独占土地二百五十六万多亩。农村耕地一半以上都集中在这些少数封建地主手里，这就造成农村经济的严重破产，使农民失去耕地而过着流离颠沛的生活。有一部份农民流入城镇，受雇于工场主和大作坊主，一般以“按月取值”的方式出卖劳动力。但他们仍未摆脱封建主义的奴役和剥削。这些工匠，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前身，他们经常用“叫歇”罢市

的方式进行反封建的斗争，成为一股新生的破坏封建制度的社会力量。封建统治者诬之为“恶匠”，并以“结党生事”的罪名，施加镇压。大部分失去土地所有权的佃农则奋起反抗封建地主阶级，减租抗租的斗争经常发生，封建统治者又加给他们有“奸佃”、“顽佃”、“恶佃”等许多罪名，对他们施行残酷的镇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农民反抗的秘密组织，如天地会、三合会、天理教等遍及南北各省，发展极为迅猛。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就又一次地爆发了以白莲教为组织形式的农民大起义，前后持续了九年，对清封建王朝进行了有力的打击。一八一三年以林清为首的天理教起义军曾打入皇宫，吓得嘉庆皇帝丧魂落魄，几个月不敢住在皇宫内。虽然这些起义被野蛮地镇压下去了，但地区性的农民暴动，仍然连绵不绝，此起彼伏。清王朝为了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便更凶残地强置人民于水火倒悬之中。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犹如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

同时，中国封建经济内部所孕育着的资本主义的幼芽正在继续缓慢地发展着，艰难地顶开了封建经济的表土。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远在明朝末就较为显著，到了清代的雍正、乾隆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在江南沿海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成长较快，虽然它还不能独立的成为取代封建制度的力量，但却起着削弱和瓦解封建经济基础的作用。当时统

织工业有了空前的发展，仅南京一地的制缎工业，就“缎机以三万计，纱、绸、绒、绫不在此数”。民间经营的纺织业一家就备有五、六百张机床，也是屡见不鲜的。此外，在冶铁业、造纸业、木材业等方面都有所发展。有些地区的商人在作私人开采矿砂的尝试。在沿海一带的几个省分里还出现了一些地主专门经营农副产品，供销国内外市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的力量不断地冲击着封建制度的围墙。可是，中国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缓慢发展的正常通路，却被资本主义的侵略者的大炮打乱了。资本主义侵略者不是要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把它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以便随心所欲地掠夺和榨取中国人民的膏血。在这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清朝政府却实行媚外投降和对内加紧镇压的反动政策，这便加速了封建统治的全面崩溃。

面对着封建王朝统治日趋衰落瓦解的局面，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正在酝酿形成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虽然有很大的增长，但还远不能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来对封建制度进行强有力的打击。这时，整个社会毫无生气，处于“万马齐喑”的局面之中。这是暴风雨来到之前天空暂时出现的一股低气压。地主阶级当权派已经麻木不仁，感触不到这种低气压的沉闷。他们却象釜底游魂一样，仍在做长治久安的黄粱美梦，认为“天下怡然”，“国家承平”。为了禁锢人民的头脑，他们抬出了孔孟程朱这几具僵尸，强迫人们把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当作神明信奉。他们顽固地坚持“天地终古不变，道不变也”的形而上学观点，并以此作为“立国之本”，“大绳大法”，不准任何人动其一根毫毛，唯恐牵一发而动全

身，陷于不可收拾的境地。谁要是对他们这一套腐朽透顶的说教有所非议，则被斥为“淫辞邪说”，“不知圣人之学”，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他们采取鸵鸟式的自我欺骗的手法，侈谈道德性命，静坐内省的唯心主义修养，置民族存亡于不顾，甚至鼓吹“血气之勇不可有”，“不好便宜并不吃亏”的投降卖国理论。

与封建地主阶级当权派不同，在地主阶级的中下层以龚自珍、魏源等人为代表，出现了一批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们透过太平盛世的虚假景象，看到反动的封建统治的腐朽本质，预感到封建地主阶级的大厦就要倒塌，清王朝已处于灭顶边缘！他们正视了这一社会现实，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孔孟之道作了尖锐的批判，开了一代慷慨论天下事的新风气，他们到前代进步思想家那里去寻找社会改革的理论根据，提出了一系列变革主张，希望清政府能够采纳，使老大天朝衰而复振。尽管他们变法措施只是希望在不触犯地主阶级根本利益前提下作一些枝枝节节的改革，是要“补”封建社会的“天”，但是他们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批判，却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潮流，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毛主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新民主主义论》）所以龚自珍、魏源等人身上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就是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在他们的思想中有着曲折的反映。战争发生后，这些地主阶级的改革派，特别是其中某些从历史的麻木状态中被唤醒的人物，能够多少地站到抗战派的一边，在不同程度上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同时也能够多少地看到人民在反对外来侵略中的伟大力量，有的还亲自参加了抗战，表现了不畏强暴的

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在参加反侵略的斗争中，不仅提出了具有某些战略、战术意义的见解，而且还最早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首开向西方学习的先河，可算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前驱。因此，龚自珍、魏源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所称道这也决不是偶然的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摆脱地主阶级的偏见，既想借用人民力量抵制外敌，又怕人民力量的发展而造成对封建统治的不利，尤其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又本能地站到了清朝政府一边。如魏源在晚年曾组织地主武装反抗太平天国，便是一例。

我们应当依据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于地主阶级改革派，既要肯定他们揭露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批判传统的儒家反动思想，反对外来侵略等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又要分析他们的改革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属性，正确探讨这一历史时期内哲学领域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从而总结出一些有益的历史经验教训。

第二节 龚自珍对儒家传统思想的批判及其哲学思想

龚自珍（1792—1841）又名巩祚，字璠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人。他生活在封建末期的晚清社会，其时程朱理学盛行，腐朽的封建制度已千疮百孔不可救药。龚自珍作为一个从科举的道路上走过来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却能力求经世致用的知识，即所谓“东西南北之学”，谙熟历史、地理、哲学、诗文甚至金石学，对蒙古语也有研究。他对封建社会弊害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无情地刻划了孔孟之徒厚颜无耻的嘴脸，大胆地蔑视和嘲弄程朱理学着

谈性命的反动说教，而对秦始皇、王安石等著名人物的历史功绩作了一定的肯定，成为历史转折时期承前启后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

龚自珍发表大量惊世骇俗的议论和慷慨激昂的诗文，深为权贵者所忌，所以他一辈子未受重用，只做了二十年地位不高的小京官。刚在五十岁那年，他辞官离京前往镇江的路上，暴死于丹阳书院。其著作有《龚自珍全集》。

一、龚自珍对儒家传统思想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

中国封建社会在其历史发展转折时期，已处于“四海皆秋气”的衰世，可是“后世儒益尊，儒者颜益厚”。地主阶级当权派和那些“儒者”却厚颜无耻，自欺欺人，极力粉饰太平。胡说什么：“炽昌熙熙，无鸡鸣狗吠之警……纲纪推校，往古无与伦比”。龚自珍愤怒地撕下了这个所谓太平盛世的假面具，他说：“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如果剥去“文、名、声音笑貌”的假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以下只注篇名）这是一幅十分可怕的社会图景！连一个治世的影子也没有，人们听不到悦耳的音乐，看不见美丽的颜色，到处是呈现着荒芜、混乱的景象，整个社会死气沉沉，消失了活力。龚自珍接着又极形象地描绘当时的社会：“人有疥癣之疾，则终日抑搔，其疮疖，则日夜抚摩之，犹惧未艾，手欲勿动不可得，而乃卧之以独木，缚

之以长绳，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则虽甚痒且甚痛，而亦冥心息虑以置之耳。何也？无所措手故也。”（《明良论》）这种衰败的社会正象一个人长满了疥癣的毛病，流脓淌血而不被医治，反被捆在一根独木床上，四肢被长绳缚住，一点也动弹不得，结果只有被折磨而死了。又好象一个临终的病人在断气前的那幅凄惨情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莫气，与梦为邻。”

（《尊隐》）龚自珍在重要的政治论文《明良论》中尖锐地抨击了当时封建官僚机构的腐朽。他认为在清朝政府中占据高位的都是一些“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只会死啃儒家经典的行尸走肉。他们“退憇而尸玩，仕久而恋其籍，年高而顾其子孙，倮然终日不肯自前去”。而一大批有才能的人尽管整天忙忙碌碌，却始终得不到重用。真是“新官忙碌石驢子，旧官快活石狮子。”那些老朽无能的旧官僚为了保住自己尊贵的地位，根本不想有所作为，弄得官场“尽奄然而毫无生气”。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朝廷用人过分强调年资、资历所产生的弊病。在这里，龚自珍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当权派。他还指出，即使有几个“才民”出来，这些老朽权贵们就会立即用“文、名、声音笑貌”（指虚伪的礼教）加以百般地摧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乙丙之际箴议第九》）用腐朽的思想去毒化“才民”心灵，使之丧尽廉耻之心，消磨有作为的意念，而这种“文、名、声音笑貌”“非刀、非锯、非永火”，却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这把软刀子就是当时弥漫思想界的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这样一来，这些“才民”也就昏庸颓唐起来，弄得“左无才相，右无才史，

闾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狙，藪泽无才盗”！（《同上》）龚自珍从心底中发出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的呼喊！他希望冲垮这种儒家思想的束缚，打破“万马齐瘖”的局面！他在杂文《病梅馆记》中痛斥儒家之徒订下的种种清规戒律来摧残人才，使他们的才能不能得到自由的发展。他认为那些文人画士借口“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病梅馆记》）而要“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同上》）使“梅皆病”，真是“文人画士之祸”！所以龚自珍主张对这些病梅“疗之，纵之，毁其盆，悉埋其地，解其桎缚”，（《同上》）让它们自由生长，并且公然宣称“予非文人画士，甘爱诟厉”。（《同上》）这是公开对封建制度摧残人才的批判。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战斗精神，从要求“病梅”解放，到公开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极端不合理性。他说：“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使其有力强武；……大都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古史鈎沈论一》）在封建社会中，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他的喜怒哀乐可以左右臣民的祸福。儒家为虎作伥，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卫道士”和鹰犬。龚自珍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和反动的性质。他说：“居廊庙而不讲揖让，不如卧穹庐；衣文绣而不闻德音，不如服囊鞬；……劳人祖父而不问其子孙，不如募客作。”（《乙丙之际塾议第二十五》）不仅如此，他还粗

浅地意识到一种新兴的社会反抗力量将严重地威胁着旧有的统治基础，这就是同“京师”（封建王朝）相对立的“山中之民”。它有不可抗拒的“一啸百吟”的声势，而且“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尊隐》）龚自珍运用了形象对比的艺术手段，对衰败的和新生的两种社会力量作了生动而深刻的描绘。他把“京师”即没落的封建王朝，形容成是处于“风恶、水泉恶、尘霾恶”的险恶的环境之中，那些朝士（指封建权贵）是沉睡在“但闻鼾声”的漆黑漫漫之夜里。但与“京师”相对立的“山中”则是“泊然而和，冽然而清”的一片山明水秀的优美景象。

“山中之民”沐浴日光，吸饮清气，孔武有力，生气勃勃。这种“山中之民”一定要以“悖悖”的手段打倒“京师”，取而代之，主宰天下。龚自珍未必看到太平天国即将兴起的曙光，但他确实听到了“大地狮子吼”！这是因为龚自珍看到了当时社会中“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陆，富者安，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平均篇》）的基本事实。社会历史的变化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同上》）这是历史的深刻教训。清王朝象“将萎之华，惨于槁木”，社会向何去？龚自珍找不到肯定的答案。龚自珍既想“补天”，但又对清王朝感到失望。他心目中所向往的社会图景，不过象幻变的海市蜃楼“光景煜爚，捕之杳冥”。（《尊隐》）处于封建社会衰败时期的龚自珍，由于阶级立场的限制，他没有也不可能认识社会发展的前途。

二、龚自珍的更法改制思想

龚自珍站在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立场上，继承了古代法

家厚今薄古、前进革新的精神。他在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变革的理论和主张。他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上大学士书》）意思是说，在古今的历史演变中，立国的大法，统治者的权势，以及具体的政治措施和社会风气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不同。这种“变迁”、“移易”，在龚自珍看来，是好事，不是坏事。他说：“法改胡所弊”？把祖宗的旧法改革一下有什么不好呢？“事例变迁胡何惧”？旧的政治措施不合时宜了，把它们改变一下，这是正常现象，又有什么可怕呢？明确地表示要对祖宗旧法作一番改弦更张的变革。他反诘那些地主阶级顽固派“奈何不思更法”？他论证了社会的发展乃是由于不断的“革前代之败”的缘故，发出了“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乙丙之际箸议第七》）的大胆议论。在他看来，“一祖之法”（祖宗的成法），没有不敝旧过时的。“千夫之议”（社会的舆论），当之者没有不披靡的。龚自珍的这种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和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有相似之处。王安石曾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在反对儒家的传统思想方面，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龚自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了王安石的这种反传统的革新精神。他极力推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书》一事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无怪当时就有人说：“定公（龚自珍）若得志，恐为王荆公”。由此可见，龚自珍的革新思想在当时是起着一定的社会影响的。

龚自珍看到了清王朝政治腐败的情况，认为这个社会已到了“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的地步。他也看到了社

会上贫富悬殊的事实。劳动人民，一无所有，愈来愈穷；剥削者，壅积资财，越来越富。这是由于大官僚地主侵夺农民耕地和繁重的赋税，造成农村经济的破产，出现“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的不祥之气，这样两极分化的结果就会“悖悖者则蚤夜号以求乱矣……乱亦竟不远矣”！农民大规模的暴动就会勃然兴起，促使封建统治的垮台。龚自珍认为不能再无视社会“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燹；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平均篇》）的现实，而在那里自欺欺人，粉饰太平。他认为“其郁者，其钥（封锁）之者咎也”，掩盖社会危机的作法乃是有罪的行为，而应该把社会矛盾揭露出来，从而“谨持其源而善导之气”，达到社会为治的目的。他正告那些因循守旧、不思变革、坚持“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的顽固派们，变是“天必有所趋”的，不想变也得变，如果执迷不悟，到头来就是“急思所以救之，恐异日之破坏条例，将有其甚者矣”！（《明良论四》）农民阶级起来就会把那些“条例”、“祖宗之法”打个稀巴烂。“与其贻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龚自珍认为与其让农民阶级以暴力手段来变革陈规陋习，彻底扫荡封建制度，为什么不应该在维护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用比较温和的方法来进行改革呢？表明了他还对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者抱有一定的幻想。在封建社会危机极为严重的情况下，龚自珍向清政府的统治者提出了以“人心为本”的建议。他说：“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运之本也。人心亡，则世俗坏；世俗坏，则王运中易，王者欲自为计，盍为人心世俗计矣。”（《平均篇》）人心怎样才能不亡呢？他的结论是“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就是说，现在治理国

家，没有比“平均”更为重要的了。龚自珍所说的“平均”并不是治世灵丹，它过不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所提出一种主观设想，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龚自珍较深刻的指出了“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的社会本质，是有积极意义的。龚自珍认为当时的矛盾是尖锐的。清王朝已临近覆灭了，但如果变法图强，发挥人的作用，还能够有所补救。他用人们御寒解暑的例子来说明政治上也可以转乱为治。他说：“冬不益之冰，为之裘；夏不益之火，为之葛，逆也。乱，顺也；治乱，逆也。”（《壬癸之际胎观第五》）人们生活在冬天，就不能再在身边增加冰块，而要穿上皮毛的衣服来抵御寒冷。夏天的时候就不能在身边生起火堆，而要穿上麻织的单衫，以抗暑热。冬冷夏热叫做“顺”，御寒抗暖叫做“逆”。龚自珍认为，一种法律和制度行得久了，就要出乱子，这也象冬冷夏热一样是必然的，是“顺”，而更法改制，变乱为治，则是“逆”。龚自珍还认为，事物发展变化有一个从“渐”到“骤”的过程。他说：“有所溃，有所郁，郁之也久，发之也必暴”。（《乙丙之际箸议第一》）他认为有些问题已经公开败露于外，这叫做“溃”，如财政枯竭和由于官吏失职而造成的连年河道决口等自然灾害。另外，有些问题，从表面上看一时尚无明显的变化，这是“有所郁”，即事物内部矛盾还处于潜伏状态。但是“郁之久”，一旦矛盾爆发，就必然剧烈而迅猛，而且事物变化过程中的“郁”并不是静止不变，事物“发之也必暴”的变化，是以“郁之也久”为基础的。

龚自珍所以能够在政治上提出一些“更法”、“改制”的主张，是以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为指导的。他看到世界上